

◎ 胡益民 / 著

文史论荟

WENSHI
LUNHUI



安徽大学出版社

胡益民 著

文史论著

何伟子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论荟/胡益民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110—385—4

I. 文... II. 胡... III. ①古典文学—古文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88 号

文 史 论 荟

胡益民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68	开 本	880×1230 1/32
	发行部 0551—5107	印 张	14.75
电子信箱	roseahbb@yahoo.com.cn	字 数	340 千
责任编辑	刘 云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85—4

定价 3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益民兄将他的论文集《文史论荟》分成四个部分编排：清代小说研究、南宋诗歌研究、张岱研究、徽学研究。他在《后记》中说，这是因为在研究单位工作，做学问要跟着课题转，无法长期在一个专题上用力气。有相似经历的人对这种情况应该很容易理解。在现下中国的高校和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单位里，课题的确定有许多外在的因素在起作用，上层机构的意愿，“社会效益”的要求，常常会压倒研究者自身的兴趣，这真是无可奈何。

但我看这四组论文，却远非互不相干、“各自为政”，内里隐然贯穿了一条线索，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与文化变迁。譬如书中南宋诗歌研究的中心是“江湖诗派”，而江湖派在中国诗史上具有引人注目的特殊性：陈起，一个书商，第一次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成员众多的诗歌流派的核心人物，诗歌的写作、流传与商人的活动第一次结合得如此紧密。作者在辑校了百万余字的《江湖派研究资料汇编》（尚未出版）的基础上，精细考证了以陈起、赵师秀等人为个案的“江湖派”作家群的基本情形；在《〈江湖〉诸总集“名录”新考》中，更根据对残本《永乐大典》和《诗渊》引书情况的详细考察，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江湖派”的结论。而所谓“徽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又完全是因为明代以来徽州商业的发达：商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影响着中国（尤其南部中国）的社会

生活。至于张岱,作为由晚明思潮所孕育而又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的文人,他的既富于感性又深于思考的文史写作,对于理解传统文化的自我变异与更新乃是重要的实例。说到清代,正如作者所言,这是统治者运用政治手段强行禁黜小说最为严厉的时代:当社会批判难以表现为理论形态时,正是这个时代的优秀小说家们,“以艺术的语言,艰难、曲折地呼唤着近代意识”(《清代小说综论》)。在这种矛盾现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潜流的涌动。

我说上面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证明作者收入本书的论文编排本身有多么严密的系统性,而是感觉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非情愿地“跟着课题转”,但其对历史的某种个人关注,他的浓厚理论兴趣与思考仍然得以保持。所谓“近代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孕育的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及冲突、中国读书人的文化品格及历史命运,显然是作者长期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描绘了在受到西方思想冲击之前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变动趋势及其现代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许多人习惯于以现存意识形态的理论模式去切割历史文献,实际上使后者成为阐释前者的材料。以现实为历史的当然,以现下的是非观念评判古人的行止,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现实”也仅仅是变化着的“历史”的一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现实”并不具备终结“历史”的当然资格。而在益民的论文中,则表现出另一种观察与理解历史的方式。他更为尊重历史原本实存的多义状态,努力从矛盾混乱的历史现象中追究存在于古人内心的问题,他们的迷惑、疑虑与挣脱宿命的激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完全穿透现实所强加的限制,却有可能从漫长的时间过程里追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了然于种种无奈、种种挫辱的悲切

苍凉,才有可能追寻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所不能放弃的永恒的渴望。

基于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加以富于哲理性的思考,作者常常能够以简明的语言打破固执的成见,提出新鲜、精确而又朴实的见解。譬如《儒林外史》,研究者常说它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向往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教条的束缚,同时又虔诚地宣传古代儒家政教。作者则认为,“这两方面在吴敬梓那里不是矛盾,而恰是统一着的”,因为“原始儒家”在吴敬梓的理解与阐释中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它的道德观富于人道的温馨,而当时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的程朱理学特别是其人性论,恰恰是对它的精神的背离(《〈女仙〉〈儒林〉合说》)。进一步,作者更精彩地将《儒林外史》中层见迭出的人物聚谈归纳为一个“精神遭遇”的大故事,“而支撑这个故事的基本冲突是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矛盾”(《〈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论纲》)。“文化现状”乃是“士”这个人物类群实存的状态,而“文化记忆”则吴敬梓一类不甘于被沉闷、无聊、令人生失去意义的现实所窒息的士人凭藉原始儒学的若干积极要素构筑起来的精神理想。说实话,这是我读到的关于《儒林外史》之题旨的最为精当和富于启发性的阐释;它不仅关涉这部小说本身,对于理解从古代的“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承担、历史命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再以徽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为例。作者所在的安徽大学是国内徽学研究的中心,他本人则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的中坚分子,为奠定这门学问做过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徽州文化与工商业活动关系密切,对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化发生过重要作用,一些徽学研究者——特别是怀有乡邦情感或为了拓展徽州旅游业的徽籍研究者,对它的赞扬往往不遗余力。然而,与商人阶层血脉相联的文人,他们的思想文化就必然具有反对专制、

解放人性的倾向和历史进步意义吗？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作者在《汪道昆及其〈太函集〉〈太函副墨〉》一文中以汪道昆为例，解析了明清时代势力庞大的徽州商业集团与官僚阶层的密切关系，官与商、儒与贾、“万钟”与“千驷”迭相为用、互为“资本”奥援的社会状况，并特别揭示出徽州文化中存在着浓重的宗法观念，汪道昆一类出身于商人家庭而身登仕途的文人常常以服膺程朱理学自诩，喜好鼓吹“存理灭欲”的理学人性论。作者认为：“我们高度估价《太函集》的文献价值，并不意味着对其思想价值的完全认同。汪道昆在思想上受程朱理学影响至深至巨；程朱理学中最落后的层面——宗法观念，特别是‘存理灭欲’的理学人性论，在其文章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尤其是那些表彰、鼓励妇女殉节的节妇传、烈妇传，如《季弟侍室妇烈方氏传》（卷三一）、《季从弟汪道者贞洁未婚妻方氏合葬墓志铭》（卷四九）等等，大多写到节妇死前自己亲临慰问（实际上是去进行‘精神鼓励’），死者死后又如何‘其面如生’（‘其面如生’四字竟有九篇节妇传、烈妇传中提到）等等。这种毫无人性的残酷表彰，在明代文人中虽不乏别的例子，但在汪道昆的集子里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典型。……埋藏在徽州贞洁牌坊和这些文人文集墓志铭里的，其实正是被有形无形的所谓‘理法’迫害致死的无数少妇少女的磷磷白骨。也正因为如此，一百余年后，同是出生于徽州的大思想家戴震和俞正燮，由于感同身受，才那样分别对理学家的‘以理杀人’提出至今依然震慑人心的抗议，对妇女改嫁引经据典地进行辩诬以‘舒愤懑’。”这样的研究确实有利于打破固执的理论模式、真切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特色。作者明确地提出：“作为今天的徽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徽州文化中极端落后的负面的东西视而不见，甚至一味礼赞如仪，不但在方法上是十分错误的，也有悖于一个现代人文工作者的基本学术良心。”这也是益民对自己所坚

持的学术价值观的郑重宣示。

重视对原始文献的清理和基本史实的追究,是本书作者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反映在《文史论荟》这部论文集中,是考证类型的文章在全书中占了一半的篇幅。一般来说,擅长考证的研究者往往轻忽论析,而以论析见长的人拙于考证也很常见。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偏缺的。没有文献考证的基础,论析手段再妙,也容易误陷于无根之谈;反之,只懂得考证,也未必真正能够发掘文献所蕴藏的价值。作者两翼并举,相得益彰,更兼通晓英文,具备西方美学、哲学理论的良好修养,素为朋辈所称羨。以张岱研究为例,尽管自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诸人彰扬晚明小品以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广为流布,其声名凡略涉中国文史者殆无人不晓,但由于张岱的大量著作长期密锁深藏,极少有人直接接触,一部分已刊行之作又遭到删改,人们所了解的张岱,其实不过是恍如隔雾的影像。赖作者多年广泛搜寻张岱所有尚存于世间的原始著作,作张岱交游考、著述考、行事考、卒年考等,我们对这位明清之际重要文学家与史学家的面貌,才有可能得到接近真实与完整的认识,并由此亲切地感受到张岱所生活的那一特殊时代的社会氛围。

作者说他多年来学问跟着课题转,那些课题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果当然远不可能完全体现于这部论文集中。关于清代小说,他另主撰有《清代小说》以及与周月亮先生共著的《〈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二书;关于张岱,他另有《张岱研究》与《张岱评传》二书;关于徽学,他编撰了规模浩大的《徽州文献综录》,并主持点校了180万字的研究徽学最基本的典籍文献——汪道昆的《太函集》。另外,他还主译了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这是深受学界关注的一部译著。实在说,真也算得上成果斐然了。然而益民对此仍然深感不满,且引冯玉祥语自嘲,谓自己

“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后记》）。这是因为他在大师如毛的时代总是用真正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锺书等为标准来苛责自己。其对真学术的虔诚敬畏可知；但因此而悲观似乎也不必：因为王、鲁、陈、钱等，百年千年才出一个；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材料、新问题出现，因而也有每个时代的学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

益民兄出身于山水秀丽的大别山，敏感而单纯，于俗世之巧慧心或知之，而身不能行。我谓益民，天地渺茫，一身漂泊，得饭吃得读书之乐可也，毋计多少。

谨序。

骆玉明

2007年12月20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骆玉明
清代小说综论	1
《女仙》《儒林》合说	19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论纲	35
《儒林外史》的“讽刺”及其他 ——与董子竹同志商榷	46
《聊斋》《红楼》合论	51
《聊斋志异》:短篇小说的艺术典范	63
《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问题”新论	79
《镜花缘》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	89
[附]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社会和个人(译文)	110
《江湖》诸总集“名录”新考	135
江湖集编者陈起交游续考	147

陈起佚诗辑补·····	152
赵师秀交游考·····	160
关于严羽的几首佚诗和生卒年问题·····	177
张岱交游考论·····	185
张岱史学著述考·····	221
张岱著述续考·····	237
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考辨·····	256
张岱年谱简编·····	265
张岱史学的成就与贡献·····	299
张岱艺术论二题·····	332
张岱的文学批评论·····	346
张岱散文四议·····	354
试论徽州典籍文献对徽学研究的价值·····	371
关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	377
《徽学文献综录》前言〔附凡例〕·····	403
汪道昆及其《太函集》《太函副墨》·····	415
汪道昆著述及版本源流考·····	429
汪道昆与《天都外臣序》作者问题考辨·····	435
后 记·····	460

清代小说综论

清代(1644~1911)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仁心”“仁政”与野蛮血腥,励精图治与空前腐败,社会生产的相对平稳发展与封建制度的畸形延续,开疆拓土的壮举与外侮危机的总潜伏、总爆发,整理古代文化的出色成就与毁灭文化的惊人罪恶……千秋功过,难于简单评说。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综论这个充满矛盾的朝代在鸦片战争(1840)爆发以前的小说创作。

一、古典小说的高峰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视小说为洪水猛兽,利用政治手段来强行禁黜的情况,以清代最为突出。自顺治至道光,几乎每个皇帝当政期间,都要亲发谕旨“严禁淫词小说”:顺治九年(1651),“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1];康熙四十八年(1709),议准禁淫词小说^[2];五十三年(1714)四月再谕礼部:“朕惟……欲正人心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

[1] 俞正燮:《癸巳存稿》,安徽丛书本,下引版本同。

[2] 俞正燮:《癸巳存稿》。

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盪惑焉。所关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1〕；乾隆元年（1736），“复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2〕；嘉庆七年（1802）、十五年（1810）、十八年（1813），三次“谕旨”禁毁小说，“不准再行编造”〔3〕；同治七年（1868）一次列入禁毁书目的就达 269 种之多〔4〕，如下文要论及的《红楼梦》、《女仙外史》等都在禁毁之列。

在中国历史上，正统文人以小说为仇寇，以最恶毒的语言加以诅咒的，也以清代为最。梁恭辰说：“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刊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5〕；曹雪芹“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6〕。陈其元云：《红楼梦》“乃康熙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矣”〔7〕。

〔1〕《康熙实录》五十三年四月，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下引版本同。

〔2〕俞正燮：《癸巳存稿》。

〔3〕俞正燮：《癸巳存稿》。

〔4〕阿英：《中国文学研究·关于清禁淫词小说》。

〔5〕梁恭辰：《劝戒四录》。

〔6〕梁恭辰：《劝戒四录》。

〔7〕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然而,也正是在清代,中国古典小说在一片禁黜、诅咒声中,进入了它的全面成熟期,在创作与批评的质和量方面,都达到了前此任何时代所不曾达到的水平,以艺术的语言呼唤着近代意识。

(一)创作

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是源于六朝“志怪”、“志人”而盛于唐的文言系统,一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白话系统。清代以前,这两个系统基本上是此起彼伏,没有得到平行发展:唐以前是文言小说时代;宋元明是白话小说时代,文言小说只是微波余绪。自清初到十九世纪中叶,清代文学笔记小说的总数在二百种以上^{〔1〕},约占清代小说总数之半。这其中固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掌故丛谈之类,但有特色的小说体作品在数量上仍是远超前代的。在艺术上,以蒲松龄为杰出代表的拟唐派作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大大发展了前代文言小说的体制。《聊斋志异》成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典范。而白话长篇小说至清代已完全踏上文人独立创作的道路,产生了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精华之大成的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美之处(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而这种文化的种种落后、愚昧之处也得到了最深刻、无情的暴露。在这个高峰之后,古典小说也随着整个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而渐趋式微了。

(二)批评

一种艺术的成熟一般总要体现在理论形态——艺术批评

〔1〕 参见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第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上。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期,也是小说批评的成熟期。

中国古典小说自产生以来就在统治阶级的压制、歧视中艰难地成长着。正统文人视小说为壮夫所不为的小道末技,更谈不到在理论上对它进行了研究。直到明末,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才有李贽(1527~1602)、叶昼(?~1624)、冯梦龙(1574~1646)等几个“叛经逆道”的文人,一反传统偏见,积极评点小说,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呐喊助威。以此为起点,清代的小说批评,名家辈出,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如金圣叹(1608~1661)评点《水浒传》,毛宗岗(生卒年不详)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1669~?)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但明伦评点《聊斋志异》,卧闲草堂评点《儒林外史》……他们的理论批评活动不仅为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同时还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中国小说的审美特征等重要问题,做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指导了创作,为清代小说的繁荣和成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清代小说的几个基本主题及其背景

以把封建伦理常本体化为根本特点的程朱理学,自它以成熟形态出现(以朱熹为标志)后,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拖住历史前进脚步的灾难。元、明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每一点进步意识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与对程朱理学这个巨大哲学幽灵的对抗、抨击联系在一起。

满清取明王朝而代之,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悉承明制”,如恩格斯所说,这本是野蛮民族入主比它先进的民族时的一种历史必然。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封建中央集权制,这自

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官方哲学方面的“悉承”,却面临着尖锐的选择,因为:其一,北宋以后,虽然结束了魏晋至唐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道统得以重建,程朱理学也曾被宋理宗、明太祖“钦定”过,但却并没有真正取得普及全国、独占思想界的地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的阳明心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1〕},“天下好称守仁者十之七八”^{〔2〕},而“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按历史的次序,这个出发点同于程朱(为封建伦常寻找“本体”根据)而归宿地却有可能通向近代的阳明心学体系,是横在新王朝面前的第一个选择对象。其二,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诸人为杰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操戈入室,在儒学内部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至巨的理学批判运动,从理论上宣布了理学的解体,经过他们的批判,“理学是决定的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4〕}。清初几十年间,统治者忙于马背征战,系统地“钦定”官学的任务便落到了亲政后的康熙帝身上。

康熙帝“自幼学问、研究性理等书”^{〔5〕}。康熙十二年(1673),命熊赐履、叶方蔼、张英、韩菼诸人各撰《太极图说》一篇进览,谓自己想研究“义理精奥”的太极图,以“究其指归”^{〔6〕}。他潜心研究理学得出的结论是:“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达理,凡所著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朕以为孔

〔1〕《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2〕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

〔3〕《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4〕杜国庠:《便桥集·论理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6。

〔5〕《康熙实录》卷二五一,第3357页。

〔6〕《康熙实录》卷四〇,第610页。

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因令将朱子配祀“十哲之列”，谕李光地等将“《朱子全书》、《四书注解》刊刻告竣，可速颁行”，同时传谕九卿，“有明于性理实学之人，各举所知”^{〔2〕}。

是什么使得康熙帝对程朱之学如此推崇呢？

1717年，康熙亲为《御制〈性理精义〉》作序，系统地阐发了他尊崇程朱的理由和指导思想。序云：

朕自冲龄至今，六十年来，未尝少辍经书。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性理之学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于理道之言，尤所加意。临位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书，颇谓广备矣。但取类太烦，类者居多。凡性理诸书行世者天下数百，朕实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学士李光地诠释进览，授其指意，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既使诸儒之阐发不杂于枝芜，复使学者之披寻不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历，性命理气之源，前人所未畅发者，朕亦以己意折中其间。名曰《性理精义》，颁示天下，读是书者，自有所知者矣。

这篇“御序”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康熙帝之好“理道之言”，推崇程朱，虽“加意”甚早，更重要的是“临位日久”，“体之身心，验之政事”后，才“玩味愈深”，而“确然知其不可易”的。用理学家的语言说，康熙帝之选定程朱学说为官方哲学，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政要。换言之，他是

〔1〕《康熙实录》卷一三。案，《东华录》及《婺源县志》引文文字略有出入。

〔2〕《康熙实录》卷二五六，第3419页。